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文物建筑

第4辑

罗哲文题



THE ANCIENT ARCHITECTURE PRESERVATIO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OF HENAN PROVINCE

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 编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1. 宁波庆安会馆戏台

2. 宁波庆安会馆戏台藻井



文物建筑

第 4 辑

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　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物建筑．第4辑／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ISBN 978-7-03-029551-4

Ⅰ.①文… Ⅱ.①河… Ⅲ.①古建筑－中国－文集 Ⅳ.①TU-0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25011号

责任编辑：宋小军 吴书雷 范雯静／责任校对：陈玉凤

责任印制：赵德静／封面设计：陈 敬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0年12月第 一 版 开本：889×1194 1/16

2010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3 1/2 插页：2

印数：1—3 500 字数：373 000

定价：8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文物建筑》编辑委员会

顾　问　罗哲文　谢辰生　杨焕成　张家泰　杨宝顺

主　任　秦曙光

副主任　赵会军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天劲　牛　宁　化建国　田　玉

田　凯　孙英民　孙新民　张玉石

张斌远　郑东军　赵会军　秦曙光

主　　编　秦曙光

副 主 编　赵会军　张玉石　牛　宁　赵明星

编辑部主任　赵明星

本 辑 编 辑　李中翔

目　　录

文物建筑研究

耀州文庙大成殿 …… 王建域（1）
广州谭氏宗祠的建筑分析 …… 胡晓宇（7）
辽宁奉国寺大雄殿建筑年代问题 …… 刘振陆　王亚平（14）
试析青海嘉木样活佛府的建筑特色 …… 李光明（21）
洛阳潞泽会馆建筑研究 …… 陈　磊（29）
中国砖石建筑溯源——对汉代画像砖石墓葬的再认识 …… 张卓远　王　伟（38）
泮池再论 …… 沈　旸（53）
影壁探源 …… 包明军　李　斌（67）
豫南地区歇山顶建筑浅议 …… 王　歌（71）
中原地区古代建筑的发展演变及其价值特点 …… 汪培梓（75）
文物建筑与建筑文化的重构 …… 李中翔（81）

文化遗产保护

遗址保护规划与城镇发展规划的协调浅议——以黄国故城保护规划为例 … 汤羽扬　郜　华（90）
城市周边大遗址保护规划思考——以山阳故城保护规划为例 …… 张　亳（96）
工业遗产保护浅探 …… 江　霆（102）
如何保护文化遗产周边环境——从保护规划谈起 …… 杨东昱（108）
城市中大遗址保护现状与对策的思考——以郑州商城遗址为例 …… 马玉鹏（113）
从奥运场馆看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相结合——在历史文化名城中当代建筑如何
　与古代文化和谐共存 …… 陈　硕（118）
湖北武当山遇真宫石质构件病害调查研究 …… 杨予川（128）
登封少溪桥勘察报告 …… 周　鼎　肖海博（135）
河南禹州“义兴公”建筑群的维修保护 …… 鲍　玮　郭江涛（148）

历史文化名城研究

许昌市老城区历史地理研究 …… 李　涛（155）
汤阴历史文化与保护 …… 陶　涛（168）

民居建筑研究

江苏淮安古民居保护探索 …… 李　诚（177）

文物建筑摄影

谈古代建筑摄影 …… 张　宁（184）

文物建筑鉴赏

宁波庆安会馆戏台建筑 …… 黄定福（189）
山西稷山稷王庙——农业始祖的祠宇 …… 刘彦俊（197）
河南内乡清代县衙 …… 徐新华　靳风月（203）

Contents

Ancient Architecture Research

The Dacheng Palace of Yaozhou Confucius Temple ····· Wang Jianyu (6)

The Architectural Analysis of Surname Tan's Ancestral Hall ····· Hu Xiaoyu (13)

The Creation Date of Ancient Building Daxiong Hall of Fengguo Temple ····· Liu Zhenlu Wang Yaping (20)

Analysis of the Architectural Features of Living Buddha Jiamuyang House ····· Li Guangming (28)

The Luze Guildhall in Luoyang ····· Chen Lei (37)

The Chinese Brick-stone Building Traces to the Source: Reconsideration of Han Dynasty Engraved Stone Tomb ····· Zhang Zhuoyuan Wang Wei (52)

Rediscussion about Panchi ····· Shen Yang (66)

The Origin of Yingbi ····· Bao Mingjun Li Bin (70)

On the Saddle Roof Building in Southern Henan Province ····· Wang Ge (74)

The Evolution and Value Features of Ancient Architecture in Central China ····· Wang Peizi (80)

Reconstruction of Heritage Buildings and Architectural Culture ····· Li Zhongxiang (89)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Planning Coordination of Sites Conservation Plan and Urban Development Plan: A Case of Conservation Plan of the Ruins of Huang Kingdom ····· Tang Yuyang Gao Hua (95)

The Protection Plan of Great Site around a City: Taking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Shanyang Ancient City as an Example ····· Zhang Bo (101)

Industri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 Jiang Ting (107)

How to Protect the Circumjacent Environ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Starting from the Protection Plan ····· Yang Dongyu (112)

On the Current Conservation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 of Great Site Covered under Modern City: Taking the Case of the Zhengzhou Shang City Site ····· Ma Yupeng (117)

From the Olympic Venues Watching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odern Design: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 How to Harmoniously Coexist with Ancient Culture i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ies ····· Chen Shuo (127)

The Damage Investigation and Evaluation for Stone Component of Yuzhen Temple in Wudang Mountain ····· Yang Yuchuan (134)

The Survey Report of Shaoxi Bridge in Dengfeng ····· Zhou Ding Xiao Haibo (147)

The Conservation of Yixinggong Buildings in Yuzhou, Henan province ····· Bao Wei Guo Jiangtao (154)

Famou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Research

Historical Geography Research in Old Town of Xuchang ····· Li Tao (167)

A Research about History, Culture and Conservation on Tangyin ····· Tao Tao (176)

Traditional Residential Building Research

Exploration of the Conservation of Traditional Folk House in Huaian, Jiangsu Province ····· Li Cheng (183)

Ancient Architecture Photography

On Ancient Architecture Photography ····· Zhang Ning (188)

Ancient Architecture Introduction

The Stage in Qing'an Guildhall of Ningbo ····· Huang Dingfu (196)

Jiwang Temple in Jishan, Shanxi Province: Ancestral Temple of Agriculture Ancestor ····· Liu Yanjun (202)

The Government Agencies of Qing Dynasty in Neixiang, Henan Province ····· Xu Xinhua & Jin Fengyue (207)

文物建筑研究

耀州文庙大成殿

王建域
（陕西铜川耀州区博物馆，铜川，727100）

摘　要

本文将耀州文庙大成殿的建筑特点与国内现存的部分古代建筑实体进行比较研究，从建筑的柱网布局、屋顶举折、梁架结构、装修彩画、扩建年代等方面解释该建筑蕴含的历史信息，认为耀州文庙大成殿具有各个时代的建筑风格和特点，并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是不可多得的中国古代建筑精品。

关键词　耀州；文庙；大成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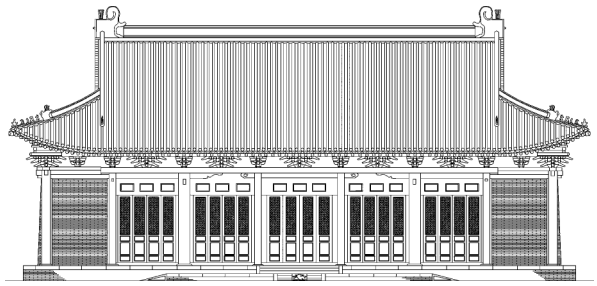
耀州文庙位于陕西铜川耀州区，创建于北宋嘉祐三年（1058 年）。整个建筑位于耀州古城北端，占地 6000 平方米，两进院落。院内以轴线布局，由南到北依次为棂星门、戟门、大成殿。1957 年 5 月 31 日被公布为陕西省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 年 6 月 25 日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古代州、县设置文庙，始于唐代。北宋中期，耀州城由步寿原旧址陆续迁入新址（即现耀州城区），原来的建置逐渐被荒废。因此，北宋以前耀州文庙的历史无从考证。嘉祐三年（1058 年），知州史炤在新城址创建文庙，按规制为“左庙右学”，那时的文庙还很简陋。元祐七年（1094 年），知州王瑛首次对文庙进行维修，增建了东西两庑和大门。金、元两代也曾有过维修。元末毁于兵燹。明朝建立后，耀州首任知州魏必兴主持重建，基本恢复了原来的建制。洪武九年（1376 年），耀州同知陈季镛修建了戟门、棂星门等建筑，形成了较完整的建筑规模。此后又经过明、清十多次维修。文庙建筑汇聚了上述各时代的不同特征。而大成殿作为文庙的主体建筑，更具代表性，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图一、图二）。

现存的大成殿为单檐歇山式，面阔 7 间，进深 5 间，殿下台基阔 27. 4 米，深 18. 3 米，高 1. 03 米，建筑面积 503 平方米。殿前是露台，台基和露台均为青砖直砌，条石压栏，做法简练凝重，保留了宋代的遗风。殿高 12. 8 米，屋顶以灰瓦覆顶，绿色琉璃瓦剪边，戗脊前部装饰仙人走兽 5 种，依次为仙人、龙、凤、狮、天马。殿内为彻上明造，梁架、椽望露明，施以彩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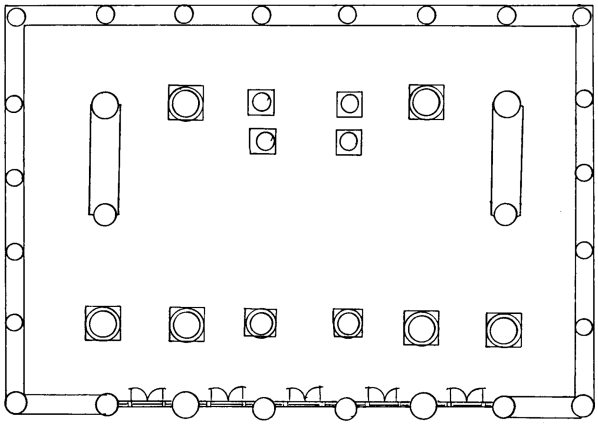


图一　耀州文庙大成殿



图二　大成殿立面图

一、柱网和柱架



图三　耀州文庙大成殿柱网示意图

大成殿柱网布局为内外槽式，一周檐柱之内，再置一圈金柱，共用柱40根，其中檐柱24根，金柱16根。在明间正中靠后的位置用4根细金柱做成小方槽，形成神龛[①]（图三）。元代以前，龛内塑孔子像，明初改为木主牌位，并用帷幕遮挡。现在柱上仍然留有铁扣。

各柱皆为直柱，高低粗细不尽相同。前檐次间、梢间檐柱和殿内次间、梢间金柱较粗，柱围在1.95～2.2米之间；而前檐明间、尽间、殿侧、殿后檐柱和殿内明间金柱都较细，柱围在1.2～1.6米之间。前檐明间两檐柱高4.07米，次、稍间四檐柱高4.17米，角柱高4.58米。殿内金柱都较高，直顶前后额枋和七架梁，达6.14米。两稍间纵向各减去1根金柱，并移动1根，使殿内空间增大，体现了宋末金初开始流行的减柱移柱法。檐柱侧脚非常明显，向内倾斜，使建筑柱架形成一个上小下大的梯形，增加了稳定性。这种做法是明以前建筑的独特之处，清代建筑则基本不用侧脚。

二、斗　　栱

耀州文庙大成殿的斗栱分两部分：一是檐下斗栱，另一是檩下斗栱。前檐为双翘双昂五踩斗栱。柱头科斗栱均为双昂，昂头为琴面昂，上施蚂蚱头。平身科如意斗栱均出45°角，做成三层，中部5间各一攒，而且每攒斗栱中心出一龙头，或含珠，或吐舌，或闭嘴，形状各异

① 根据贺林1984年11月《耀县文庙大成殿平面图》绘制。

(图四)。两尽间平身科斗栱与柱头科相似，只是做成三昂，上面不用蚂蚱头，做工较粗糙，与中央 5 间风格不一致。整个斗栱均为计心造，用材宽厚，可见其结构性较强。殿侧、殿后皆为双翘，单材栱使用较多。



图四　耀州文庙大成殿前檐斗栱

殿内檩下斗栱出现在脊檩和下金檩下，以大斗上横向出栱加散斗托檩，纵向出木板做成批竹形状。与檐下斗栱相比，发挥了更多的装饰作用，也保留着宋代的特点。就檐下斗栱与柱高的比例关系来说，唐至清呈现逐渐缩小的趋势。唐代建筑的斗栱与柱高之比为 1∶2，清代则是 1∶6。耀州文庙大成殿的斗栱与角柱的比例要小得多，仅为 15.3%，即 1∶6.5，甚至比清代故宫文渊阁的都小。这种比例关系恰恰是古建筑鉴定的一个重要依据。

通过比较不难看出，耀州文庙大成殿具有自己独特的地方：斗栱用材宽厚，但高度很小。柱以上的大部分高度都被明成化十一年（1475 年）维修时增加的那根圆木大额枋占据了。如果加上这根大额枋的高度，斗栱比例可达 26%，即 1∶4，介于宋代与清代之间。

三、梁　　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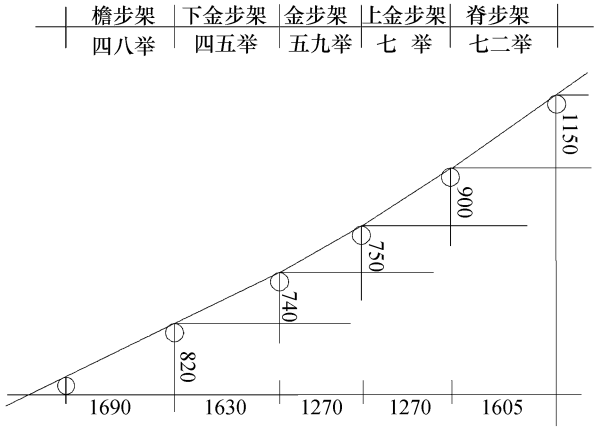


图五　耀州文庙大成殿梁架（由西向东）

大成殿的梁架为十一檩大木作，檩下各种材料极为粗大（图五）。前檐大额枋、殿内前后 2 根额枋和三、五、七架梁均用整根圆木做成，不加雕琢。前檐正中 5 间上的大额枋长达 18.7 米，直径 0.7 米，直接横置在 6 根檐柱上，上部放大斗，承接斗栱，省去平板枋、小额枋等枋材。前檐两尽间上则使用平板枋，其断面增大，呈正方形；而小额枋则较小，呈现长方形断面，为金代的做法。殿内横向的两根额枋长达 11.8 米，上承 6 根纵向的七架梁长为 9.5 米，跨度 3 间。这样大的跨度在国内并不多见，构成了大成殿的主要特点。具有同样建筑手法的还有陕西旬邑县文庙大成殿（建于明代，面阔 5 间，前檐也用一根圆木做大额枋，横跨 3 间)。现存于陕西韩城普照寺的元代建筑高神殿，也以整根圆木做大额枋。可见，这种简练粗犷的建筑风格在元明时期的陕西渭北地区曾经比较广泛地流行。

殿内各檩下均有枋材。在二者之间，则交替使用瓜柱、叉手、托脚、柁墩等材料。脊檩下脊瓜柱与叉手并用，叉手用料已变细，约为瓜柱的三分之二。下金檩下用柁墩，外侧加托脚。两檩下施斗栱和歇山的做法，都较多地保留了宋代的建筑手法。两侧歇山不用采步金和踏脚

木，也不用草架柱子，而是直接把两山的檐椽通过金檩上面，后尾搭到山架下的七架梁上。山架外面钉山花板封住。这种做法与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颁行的《营造法式》要求一致[①]。



图六　耀州文庙大成殿屋顶举架示意图

另一个具有宋代建筑特征的是举高。举高是决定屋顶高度及坡度的一种计算方法，即前后檐进深水平距离与高的比例，也就是三角形底边与高的比例关系。唐代建筑的屋顶举高较低，坡度缓，出檐深远，具有舒展大度的气势。例如山西五台山南禅寺大殿是一座唐代建筑，其进深与举高之比为6∶1；宋代建筑为4∶1～3∶1，如山西榆次永寿寺雨花宫为3.88∶1。到了明清则增高，清代的有些建筑则达到了2∶1。耀州文庙大成殿的举高为3.5∶1，符合宋代建筑的制作规定（图六）。

表一　古代建筑举架对照表[②]

建筑名称	时　代	檐步架	下金步架	金步架	上金步架	脊步架
五台山佛光寺大殿	唐	三五举	三三举	三七举	四三举	六〇举
山西太原晋祠	宋	五举	三六举	四六举	六八举	七三举
耀县药王山元殿	元	四九举	—	五五举	—	七六举
耀州文庙大成殿	明	四八举	四五举	五九举	七举	七二举

举架即步架进深水平距离与高度之比，由表一得知，文庙大成殿的屋顶和步架都具有宋代风格。

大成殿的出檐，按照现存古建筑实例分析，唐宋建筑的出檐都比较深远（表二）。出檐的尺寸取决于檐下斗栱与柱的比例关系。斗栱比例大，出檐自然多；斗栱比例小，出檐也就少。这就是唐宋建筑的屋檐比明清建筑显得舒展大度的原因。耀州文庙大成殿虽然具有宋代建筑的举架，屋顶平缓，但出檐却比较短小。从殿外看，就缺乏那种舒展大度的气势，表现出了清代的拘谨，略显呆板。

表二　古代建筑出檐对照表

建筑名称	时代	出檐与柱高之比
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	唐	1∶1.8
山西太原晋祠	宋	1∶1.8
山西平遥文庙大成殿	金	1∶1.5
耀州文庙大成殿	明	1∶2.8
故宫太和殿	清	1∶2.3

① 罗哲文：《中国古代建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② 朱小平、朱丹：《中国建筑与装饰艺术》，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

四、装修及彩画

大成殿的小木装修与整座大殿的风格一致，中央 5 间各对开两扇格扇门，两尽间为清水砖墙，不留窗，与殿侧、殿后檐墙相同。门为五抹格扇，以直棂宫字和斜棂相交，极为简练。殿内两稍间靠后半间纵向各有一面墙，墙身刷白，上部做成墙肩，与七架梁相接。关于这面墙，目前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明弘治八年维修扩建时原 5 间山墙之遗迹；另一种是此墙前塑十哲像，墙上用来画彩画，现存山西平遥文庙大成殿内就是这样。但平遥文庙大成殿内另有内墙与此墙连接，将殿中孔子塑像与后檐墙隔开，在殿内形成一个倒“凹”字形的布局，而耀州文庙大成殿并没有这样的布局设计和遗存。笔者同意前一种说法。

殿内彩画是 1990 年由西安文保中心重新测绘设计，为“石碾玉旋子彩画”，风格大方，布局灵活，富有地方特色。

五、大成殿扩建年代略考

关于文庙大成殿的扩建，即由 5 间改做 7 间，多年来都认为是明成化十一年耀州知州邓真修建时所为。但是，明成化十三年（1477 年）刻立的《耀州重建庙学之记》碑，和 2004 年 5 月 20 日出土的成化二十二年（1486 年）《邓侯德政之碑》，均未提及扩建之事，只是记录了文庙维修的经过，如屋顶改覆琉璃瓦、前檐及殿内使用民间所献之大木等。以下就从三方面叙述大成殿的扩建问题。

（1）资料记载的扩建历史。明代张琏《耀州志》“儒学卷”中，收录了明代张天瑞撰写的《耀州重修庙学记》碑文，明确记录了弘治五年（1492 年）知州任奎到任后维修文庙学校的经过：“……弘治壬子（即弘治五年）夏，盐山（今河北盐山县）任君文耀来守关西之耀州，政甫通，人民甫和，即专意于学校。”“……于是锻励坚材施以备，而殿、庑、堂、斋以及号舍、庖、厨次第就绪。”文庙“旧盖自创始于嘉祐，重修于元祐，再创于洪武之乙酉（1369 年），重修于正统之乙丑（1445 年）。至是凡五改作，始底于完美，诚一时之盛举也”。该志《建置志第二》又记载：“儒学在州治西北文庙右，……弘治八年知州任奎复改建。”可见文庙学校维修扩建的具体时间。

（2）大成殿的建筑风格不一致。大成殿从成化年间大修、弘治扩建后，留下了不同的建筑风格。首先，殿前中央 5 间使用一整根圆木作为大额枋，直接横置在 6 根檐柱上，上部放大斗，承接斗栱，省去平板枋和小额枋等枋材。前檐两尽间则使用平板枋，用料比较齐全。这显然不是成化十一年维修时一次性设计、施工的结果。

（3）扩建的历史背景。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走上政治舞台以后，受到了历代统治阶级的尊崇，不断追封。明朝以来，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明史》“志第二十六• 礼四”记载，成化“十二年（1476 年），从祭酒周洪谟言，增乐舞为八佾，笾豆各十二。弘治九年（1496 年），增乐舞为七十二人，如天子之制”。从此，全国各地文庙建筑和祭祀规模纷纷升级。而邓真在成

化十一年（1475年）大修时，还没有这个规定，不可能擅自僭升。

综上所述，耀州文庙大成殿由5间扩建为7间，是在明弘治八年（1495年）知州任奎在任时所为，而不是邓真。

耀州文庙大成殿经历了北宋到清代十多次的维修，保留了各时代的建筑特征。屋顶举折、歇山做法、台基等是宋代风格，柱网布局、减柱移柱、平板枋做法是金元手法，屋面瓦作、殿内彩画是明代特点，斗栱与柱的比例和出檐又是清代特征。再加上明代修建的棂星门、戟门、清式东西两庑和耳房，构成了耀州文庙丰富多彩的建筑群。简而言之，说耀州文庙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古代建筑史，实不为过。

The Dacheng Palace of Yaozhou Confucius Temple

Wang Jianyu

（Yaozhou Museum of Shaanxi Tongchuan, Tongchuan, 727100）

Abstract: The article makes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architectural features of Dachengdian of Yaozhou temple and some domestic extant partial ancient architecture entities. It interpretes the architecture historical information from the architectural columns network layout, the pitch and curvature of roof, the erection of straddle structure, the decoration colored pattern, the extension time and so on. The article believes that Dachengdian of Yaozhou temple has the architectural style of each time and features, and has a distinct local flavor. It is a rare ancient Chinese architectural master piece.

Key words: Yaozhou; Confucius temple; Dachengdian

广州谭氏宗祠的建筑分析

胡晓宇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510030）

摘　　要

2008 年 7 月，为了完善文物保护单位的“四有”档案资料，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测绘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谭氏宗祠，并同时通过实地访问、查阅《谭氏族谱》等地方资料的方式对其进行了历史沿革的调查。在此过程中，通过对基本数据的分析、历史文献和口碑资料的整理，为研究其历史沿革、古建筑断代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

关键词　谭氏宗祠；建筑历史

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谭氏宗祠位于花都区炭步镇文一村。作为当地谭氏宗族用于公共活动的建筑，谭氏宗祠广二路，现存建筑总占地面积 500 平方米。主体建筑三间三进，通面阔 11. 58 米，通进深 23. 24 米，由头门、牌坊、后堂组成，其间又以天井和廊相连。主体建筑的北侧隔青云巷设有衬祠。宗祠前保留有宽 11. 35 米，深 11. 46 米的地堂[①]，但现地堂三面均被围蔽：左右两侧建围墙、设门，前方为 2006 年重修的“文宪书舍”。

一、建筑测绘概况

宗祠朝向西偏北 20°，头门三间，面阔 11. 58 米，进深 6. 25 米（图一）。硬山顶，碌灰筒瓦，灰塑博古纹脊饰，墙体下砌 1. 55 米的花岗石，上为青砖。前檐柱石质、方形，边长 28 厘米，通高 4. 02 米。九架檩，脊檩底皮相对室内地面高 5. 39 米。上金檩下砌厚为 34 厘米的墙，把头门分隔成前后廊。前后廊的梁均直接搭于墙上，使墙承重，其当心间开大门。花岗岩石门夹，双掩木板大门高 2. 52 米，宽 1. 3 米，门洞背面上方的砖墙砌一伏一券的拱以分散上部荷载。前廊双步，木雕异形梁架，石檐柱。前廊两次间设虾公梁（石连系枋）和石狮。前廊山墙的厚度（36 厘米）大于后廊（35 厘米）。后廊无檐柱，以檐墙承重，梁上以瓜柱承檩，梁架简朴无木雕。后廊明间设挡中，其整体均明显为近年维修时新造，原形制已不可



图一　谭氏宗祠头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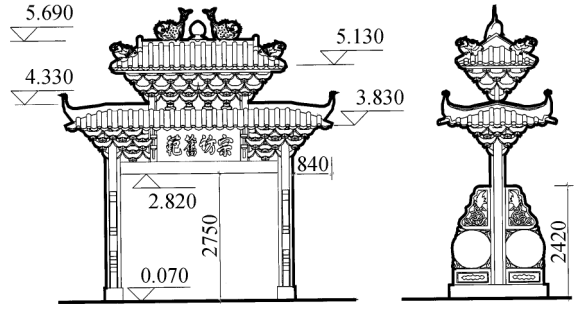
① 当地人的叫法，意指建筑前面开阔平整的旷地。

考。两次间的后檐墙各设一伏一券的拱门通天井两侧的廊，门额分别灰塑“起凤”、“腾蛟”字样。

牌坊立于头门之后，一间两柱，重檐，歇山顶，阔 3. 8 米（图二、图三）。现正脊灰塑鳌鱼宝珠，戗脊灰塑鳌鱼，角脊为反翘的凤尾，碌灰筒瓦，瓦当、滴水剪边。两层檐下均设三层的如意斗栱，以加大出檐的深度。牌坊正面嵌匾额“宗访旧范”，背面为“景仰遗徽”。鸭屎石质八角柱，边长 13. 8 厘米，柱高 7. 48 米，石柱直接承脊檩。柱前夹杆石总高 2. 12 米，为明代的鸭屎石构件，刻壶瓶牙子和直径为 85 厘米的抱鼓；柱后夹杆仿之复制，但改用花岗岩石。两侧柱子和夹杆各立于一块长 4. 36 米、宽 0. 8 米、高 0. 6 米的条石之上，条石增加了牌坊的净高，使之更显气势。



图二　牌坊正立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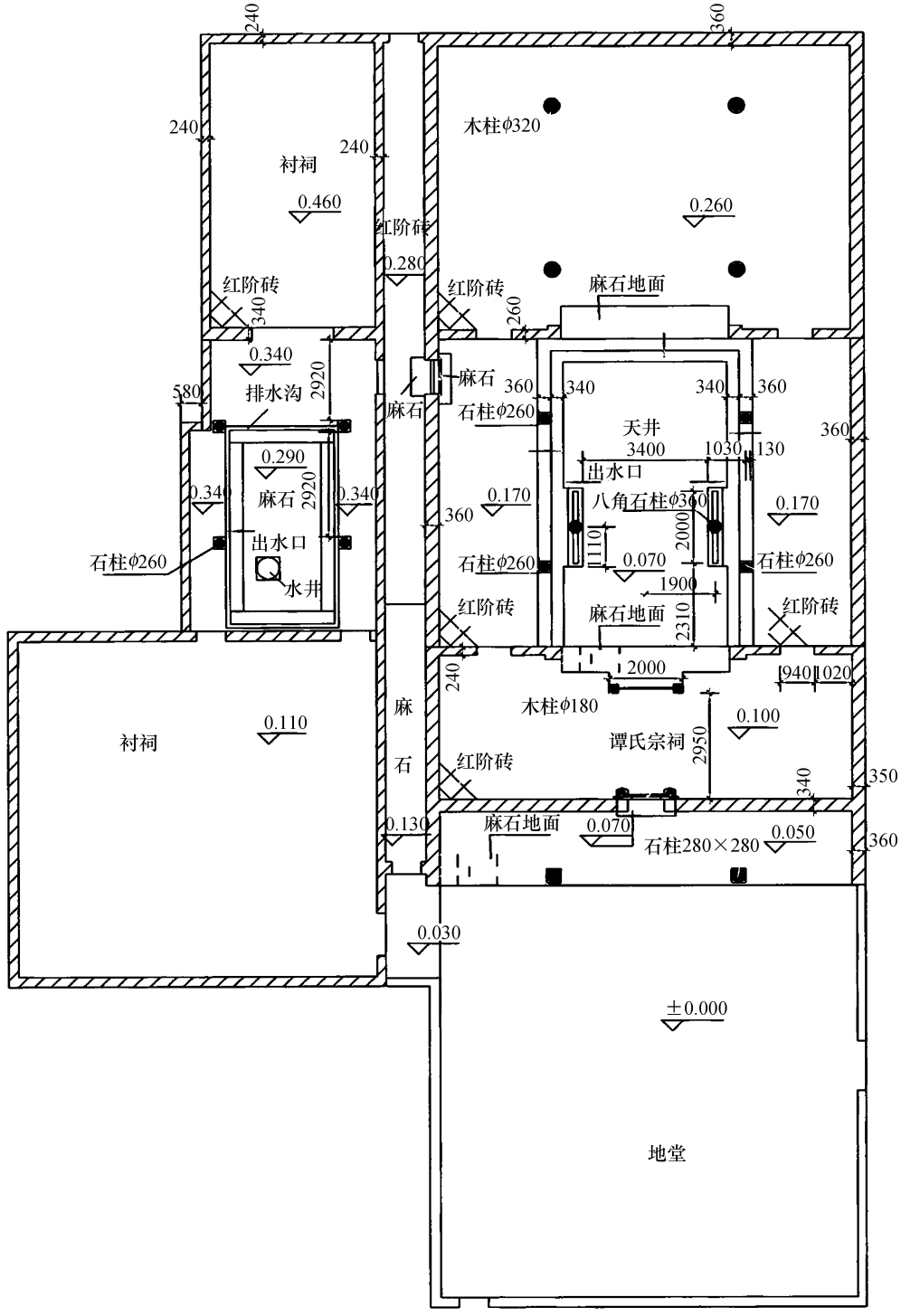


图三　牌坊实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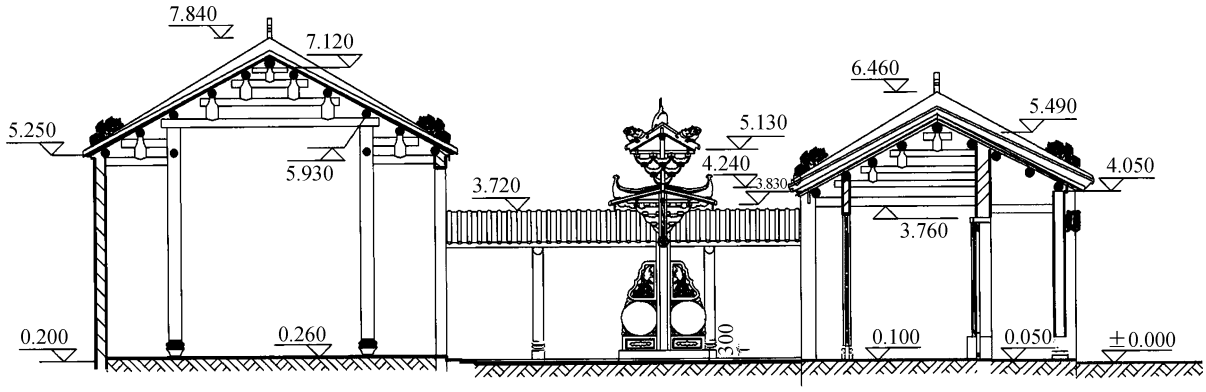
天井以花岗岩条石铺地。两侧为廊，各面阔三间 8. 81 米，深 3. 4 米。碌灰筒瓦，六架卷棚顶，罗锅形桷板的最高点距离室内地面高度为 3. 57 米。前檐柱石质，圆形，直径 26 厘米，通高 2. 6 米。梁上设瓜柱承檩，前檐石柱和后檐墙承重，梁架简朴无木雕。

后座追远堂，面阔三间 11. 58 米，进深三间 8. 18 米。硬山顶，碌灰筒瓦，灰塑博古纹脊饰，青砖墙。十一架檩前后廊式，前、后廊均为双步梁。前、后檐均无柱，以檐墙承重，梁上设瓜柱承檩，梁架简朴无木雕。圆形木金柱，直径 32 厘米，柱高 5. 47 米。脊檩底皮到室内地面的高度为 6. 86 米。两次间的前檐墙各设一伏一券的栱门通天井两侧的廊，门额分别灰塑“由义”、“居仁”字样。堂上设木雕龛罩和供桌供奉谭氏历代祖先牌位。

北侧祠祠原为一间两进，现第一进已完全被改建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原貌已荡然无存。第二进仍为原砖木结构，前出六架卷棚廊，室内无梁架，檩直接搭于两侧山墙。第二进前的天井带两廊，面阔二间 5. 84 米，深 1. 04 米，单步木雕异形梁架。天井内有古井一口，青砖砌筑的圆形井壁，方形井沿，四角石雕钱纹装饰（图四、图五）。


240
360
240
240
木柱φ320
衬祠
0.460
0.260
红阶砖
0.280
红阶砖
麻石地面
红阶砖
340
260
0.340
麻石
360
340
340
360
580
排水沟
2920
麻石
石柱φ260
天井
360
3400
1030
130
0.290
出水口
0.340
麻石
2920
0.340
0.170
八角石柱φ360
0.170
360
1110
2000
出水口
0.070
石柱φ260
石柱φ260
石柱φ260
水井
1900
红阶砖
麻石地面
2310
红阶砖
2000
940
1020
240
麻
木柱φ180
0.100
0.110
衬祠
谭氏宗祠
2950
石
红阶砖
340
350
0.130
麻石地面
0.070
石柱280×280
0.050
360
0.030
±0.000
地堂

图四　谭氏宗祠平面图



图五　谭氏宗祠纵剖面图

二、建筑的壁画解析

谭氏宗祠的建筑装饰手法简单，木雕、砖雕、灰塑等无太大特色，只有壁画数量较多，风格也不尽相同，且多数有详细的落款，为我们研究其历史沿革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图六　壁画《商山四皓》

头门石匾额上方的壁画《商山四皓》，落款“褶镜秋题意”（图六）。壁画描述的商山四皓，指的是秦末汉初（公元前 200 年左右）的东园公唐秉、甪里先生周术、绮里季吴实和夏黄公崔广四位著名学者。他们不愿意当官，长期隐藏在商山，出山时都 80 岁有余，眉皓发白，故被称为“商山四皓”。刘邦久闻四皓的大名，曾请他们出山为官，而被拒绝。他们宁愿过清贫安乐的生活，还写了一首《紫芝歌》以明志向，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何归？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之畏人兮，不如贫贱之肆志。”刘邦登基后，立长子刘盈为太子，封次子如意为赵王。后来，见刘盈天生懦弱，才华平庸，而次子如意却聪明过人，才学出众，有意废刘盈而立如意。刘盈的母亲吕后闻听，非常着急，便遵照开国大臣张良的主意，聘请商山四皓。有一天，刘邦与太子一起饮宴，他见太子背后有四位白发苍苍的老人。问后才知是商山四皓。四皓上前谢罪道：我们听说太子是个仁人志士，又有孝心，礼贤下士，我们就一齐来做太子的宾客。刘邦知道大家很同情太子，又见太子有四位大贤辅佐，消除了改立赵王如意为太子的念头。刘盈后来继位，为汉惠帝。旁边两幅壁画分别为《公孙福庆》、《登科及第》，落款与之同。前廊山墙墙楣壁画《秋江送酒》、《雁塔题名》，落款均为“时在辛亥年□□月上浣镜秋题意”（1911 年）。后廊壁画《福自赢来公孙耍乐》，落款“民国岁次戊午年中秋节作画南邑□素轩翰墨主人贯行氏关通绘”（1918 年）。壁画《白□富贵》、《碧□富贵》落款“褶镜秋”，壁画《老安少怀》、《李白斗酒》、《教子朝天》

无落款。

南侧廊的墙楣壁画《叱石成羊》、《汉鼎图》、《扁舟一叶何处来》、《鹿鸣加燕》、《诗礼传家》、《二甲加官》等，落款“民国岁次戊午中秋画南邑关通戏墨”。壁画《果老归隐》落款“南邑联镳主人贯行氏关通画”。其中《叱石成羊》的画题为“年当十五始离乡，一入金华品异常，若则遇兄寻故物，奚须叱石变成羊”，壁画描述的是东晋时金华人黄初平得道修炼成仙的神话故事。北侧廊的墙楣壁画《渔樵耕读》等，落款“禩镜秋”。

后座墙楣壁画《渊明赏菊》落款“南邑关潘戏墨”，《和气生财》落款“民国岁次戊午年中秋节作画南邑关通拙摹”，《松脂益寿》落款“贯行氏关通画”，《弍品当朝》等。壁画《青莲醉酒》画题“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落款“贯行作”。李白自称“青莲居士”，画题取自杜甫的《饮中八仙歌》中描写李白的四句诗文。

衬祠第二进的前廊墙楣有壁画《福禄寿三星图》、《别有蘠坌》。《福禄寿三星图》落款“民国岁次甲子年六月廿九日作画明生关潘戏墨”（1924 年）。壁画《别有蘠坌》的“蘠坌”通“天地”，落款“关贯行画”，其取材于《李太白全集· 山中问答》诗“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中的意境，歌颂了李白在被唐玄宗封为翰林学士三年后因为不愿事权贵而辞官归隐的事迹。

三、对建筑历史的分析

谭氏宗祠所在的整个村落在初建时名为“文岗”。1958 年，被分为文冈第一合作社、文冈第二合作社，简称为文一、文二，此称一直沿用至今。而谭氏宗祠则属于文一村。

在调查访问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由村委会编撰的资料《美丽的文冈村》中有载：“谭氏宗祠追远堂约建于明成祖永乐十八年（1421 年）。”但我们在当地谭氏族人的族谱《谭追远堂》中并没找到与该宗祠有关的任何记载。

在族谱《谭追远堂》中的《谭氏族谱原序》记载：“祖岩隐公乃南昌府保昌县人也，本居沙水村珠玑巷，去城三十里。娶袁氏，生四子。于宋神宗元丰四年辛酉十月携家至广州府，遂卜居山后良村，由是若子若孙或迁……如海公迁居文冈，生三子……”主体建筑的天井北侧廊内墙上嵌有一块 2006 年的《谭氏宗祠重修碑记》，据碑文记载：“吾族祖先，为周朝封于山东之谭国，源远流长。岩隐公于宋神宗元丰四年（1018 年）自南雄府南迁，卜居良村，为吾文冈谭氏之始祖。此后子孙繁盛，遍布各地。其十二世祖如海公又从良村迁居文冈，至今已六百余载。吾村谭氏宗祠建于五百年前，属明代建筑……祖祠前原‘青岗公祠’因‘土改’时分给私人所有，年久失修，已变得面目全非，现由祖祠出资，从私人手里赎回，并进行大面积重修。重修后改名‘文宪书舍’，统归祖祠所有。祖祠于 2006 年元月举行重修落成典礼……”

据说谭氏宗祠的牌坊始建于明代。从测绘数据来分析，现存如意斗栱的高度与柱高分别为 1430 和 7480 毫米，比例为 1∶5. 23，栱厚与栱高分别为 45 和 110 毫米，比例为 1∶2. 44，下层檐

从挑檐枋中点到瓦当的水平距离与柱高分别为 1300 和 7480 毫米，比例为 1∶5.75；大斗的耳、平、欹分别高 35、25、35 毫米，比例为 1.4∶1∶1.4。《清式营造则例》中记载的斗栱总高度与檐柱高的比例一般为 1∶5，栱厚与栱高的比例一般为 1∶1.5，大斗的耳、平、欹高度的比例一般为 2∶1∶2。

经比较，可知谭氏宗祠牌坊的出檐比头门与后座深远，如意斗栱与柱高的比例十分接近明清时期的北方官式建筑，即斗栱在增加出檐深度、结构承重等方面的功能还未明显退化，确有明代岭南建筑的遗风。但是其栱断面开始趋于高窄，斗口的深度开始减少，使斗栱的稳定性削弱。可见，谭氏宗祠的牌坊应始建于明代，但是能保留下来的典型的明代构件只余柱前的夹杆石，现存斗栱应为清代维修时仿明代的样式重制。牌坊的脊饰比例与其整体极不协调，且造型无明代鳌鱼脊饰的特点，应为后来某个时期维修时所制。

在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明清时期，立牌坊是一件极为隆重、极不容易的事，根据当时的规定，这是由各级官府乃至最高统治者来控制的一种官方行为。谭氏宗祠内能建牌坊，必定是对当时谭氏宗族内某个人或者这个家族乃至这个地方的一种至高无上、无与伦比的殊荣。在调查期间，据当地谭氏后人介绍，因历史上谭氏宗族里曾有人为驸马，故由皇帝赐建“景仰遗徽”牌坊，但在谭氏族谱《谭追远堂》里却对如此重大的事情没有任何相关的记载，因此我们无法断定其真实性。

从宗祠壁画的落款来看，谭氏宗祠现存的壁画大部分均为民国时期所绘，创作时间在 1911～1924 年之间，在此期间宗祠应有过不同程度的维修。不同时期的主要画者分别有三个：1911 年的褶镜秋、1918 年的关通、1924 年的关潘。这些壁画虽已是民国时期所做，但是画风清新古朴、线条细腻流畅，从题材到风格仍与晚清时期的壁画十分接近。

通过与有明确纪年的民国时期壁画的比较，可以推断如《老安少怀》、《李白斗酒》等创作时间更晚，在题材上虽仍刻意模仿清代壁画，但是画面显得线条简单、人物造型粗糙，画作的艺术价值已大不如前。

四、结　　语

从建筑的形制与风格来看，现存谭氏宗祠的头门和后座均为清中晚期的岭南建筑，这种建筑形式在岭南地区为数较多。民国维修时保留至今的壁画有一定的艺术价值。谭氏宗祠的建筑艺术价值主要体现在牌坊上。该牌坊始建于明代，现存木结构多为清代重修，但很好地保留了明代建筑的风格，为我们研究岭南地区的明代建筑木构架提供了一个例证。

The Architectural Analysis of Surname Tan's Ancestral Hall

Hu Xiaoyu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e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of Guangzhou, Guangzhou, 510030)

Abstract: In July 2008,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files of Cultural Relics Preservation Vnits, the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e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of Guangzhou organized to survey and map the municipal cultural relics preservation unit: the Tan's Ancestral Hall, and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the field visits, access to "Tam Genealogy" and other local material way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investigation has been carried out. During this proces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basic data, the historical document and the reorganization of oral material's, reliable scientific basis has been provided for studying its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the historic division of the building.

Key words: Tan's Ancestral Hall; architectural history

辽宁奉国寺大雄殿建筑年代问题

刘振陆[1]　王亚平[2]

（1. 辽宁省锦州市博物馆，锦州，121000；2. 辽宁省文物保护中心，沈阳，110000）

摘　　要

奉国寺大雄殿是一座重要的辽代建筑，但其建筑年代因未发现始建碑刻和题记，仅依元代碑文所记，而元碑与其他文献记载并不一致，故建筑年代尚有质疑之弊。本文拟从建筑的结构和制度特征等方面入手，与辽代纪年建筑比较，补证大雄殿的建筑年代确为辽开泰年间，元碑的记载是可信的。

关键词　奉国寺；大雄殿；创建年代

奉国寺是一座著名的辽代寺院，位于辽宁省锦州市义县城内东街。初名咸熙寺，金代改称奉国寺，现仅余大雄殿为辽代建筑，常与华严寺薄伽教藏殿、独乐寺观音阁、应县木塔并提，作为重要的古建筑实例。然华严寺、应县木塔和独乐寺建造时代有明确记载，唯独奉国寺始终没有发现创建时的碑刻，后世碑刻对奉国寺创建年代的记载又不一致，因此创建年代和建寺原因遂成争论之一，甚至有人质疑其“建于开泰九年”的可信性。加之当地早有“为皇后建寺”的传说广传于民间，更添奉国寺建筑年代判定之惑。

关于奉国寺的创建时间，一直以来多数文章在论述中均依据元大德七年《重修大奉国寺碑》所记之“辽开泰九年”①，这一结论也被广泛认可。但是以后世碑记为依据毕竟不如创建碑让人信服，而且一直没有人从建筑特点入手证明碑记的可信性，故对建筑时代的认定仍然有不同的声音，总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认识。

第一种观点，认为奉国寺始建时间早于辽代。这一观点主要依据光绪十年《重修大佛寺碑》中“且夫心存礼佛，则七宝装之所存，必宜修理，而势若补天，叹五色石之难炼，大费踌躇，维兹义郡东街，旧有奉国寺一所，观其碑志，在大辽已属重修”的记载。但值得注意的是，据《奉国寺纪略》载，清朝光绪八年（1882 年），维修大雄殿时有“八门尺”从东南角梁架上坠下，上面写着“辽开泰九年正月十四日起工”，但该尺已失②。而《奉国寺纪略》所说的“八门尺从东南角梁架上坠下”正是发生在此次维修过程中，碑中所说“大辽已属重修”明显与“辽开泰九年正月十四日起工”的记载相互矛盾。且自光绪十年上距大德数百年，未见有记述辽碑，《续通志》更在百余年前成书，而辽碑未见著录，足见辽碑早佚，因此“大辽已属重修”一说纯属臆测，实难为据。

第二种观点，认为奉国寺始建于辽开泰二年（1013 年）。认为奉国寺建于辽开泰二年者，

---

① 该碑现存于奉国寺大雄殿内西侧。

② 王鹤龄：《奉国寺纪略》，正文第五页，“创建”条载“辽开泰九年正月十四日起工，创建咸熙寺，至十四年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止工”。并注“见八门尺载”，“光绪八年，修大佛寺时，有八门尺，由大雄殿内东南角坠下，工人拾之。其尺系用木工画尺子书字文曰，辽开泰九年云云，嗣由本寺院内顿三先生鉴亭收存保留，至顿鉴亭先生故后，该八门尺不知所归云”。

一般依据《续通志》。《续通志》著录已佚的金石目中收录的《奉国寺石幢记》一条下注有“正书、开泰二年、义州”[①]。而所谓“开泰二年”、“ 奉国寺”显然与现存碑记相互矛盾。按元大德七年（1303 年）《义州重修大奉国寺碑》“寺曰咸熙，后更奉国”的记载，开泰年间该寺应称“咸熙寺”而非“奉国寺”，且同书卷一百六十九又收录了元大德七年《重修大奉国寺碑》，却未对相互矛盾的两条作任何补注，实难令人相信此幢确曾存在。总之，石幢已佚，证物已失，建于开泰二年之说也就没有了让人信服的依据。

第三种观点认为，奉国寺是由辽穆宗应历年间所建宫殿改为佛教寺院，即“改宫为寺”。这一观点的提出是根据 1970 年在朝阳县西大营子乡西涝村出土的景宗保宁二年（970 年）《刘承嗣墓志》，该墓志载：“遇朝廷之更变，随銮辂之驱驰，因缘私门崇重释教。创绀园之殊胜，独灵府之规谋，据蒙任能，俾辖若拙。始终宜州大内，又盖嗣晋新居。”同碑又载“蒙天顺皇帝应历十二年有制，充左骁卫将军，得归燕京，且言乐职”[②]。作者据“宜州大内”一语认为刘承嗣曾在原宜州境内营建宫殿，而除奉国寺外，在义县境内尚未发现有任何较大的古建筑遗址。故认为刘承嗣所建的“宜州大内”很可能后来改为佛寺——即奉国寺。并据此认定奉国寺应始建于辽穆宗应历元年至应历十二年之间（951 ~962 年），不过当时是“大内”，而不是佛寺。后因皇权稳定于耶律贝一系，大内已经无存在之必要，故于辽兴宗重熙年间将“大内”改为佛教寺院，并雕塑了七佛[③]。初看，上述观点似乎有一定道理，但这一观点也犯了同前两种推断同样的错误，即单纯依靠文献记载而忽略了正确分析建筑结构特征在判断古建筑时代方面的重要意义。梁思成先生早在《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纪行部分就已经指出“我国建筑之结构原则，就今日已知者，自史后迄于最近，皆以大木架构为主体。大木手法之变迁，即为构成各时代特征中之主要成分。故建筑物之时代判断，应以大木为标准，次辅以文献记录，及装修，雕刻，彩画，瓦饰等项，互相参证，然后结论庶不易失其正鹄。本文以阐明各建筑之结构为唯一目的，于梁架斗栱之叙述，不厌其繁复详尽，职是故也。唯执笔时最感困难者，即辽金两代文献残缺”[④]。这一段话可谓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方法论核心，对中国建筑研究的年代判断方法和调研方法作出了方法论总结，奠定了此后中国建筑历史研究方法的基石，明确了中国古代建筑断代的基础应首先从建筑的构件手法和结构特征入手，以文献题记为佐证，旁证的论证方法，这一方法论原则在奉国寺的时代判断上尤为重要，但却一直被关心奉国寺建筑时代的人所忽略，而舍本逐末，偏重旁证。

实际上，在对殿身梁架勘查中发现，梁上彩画，尤其是飞天彩画全部绘于梁栿安装上架之前，例如，在前槽明间西缝和西次间西缝可以清楚地看到，上层四椽栿底面所绘飞天的脚及衣纹下部延伸到上层四椽栿与下面华头子交接部位之内，一部分被下面华头子遮蔽，其他绘于上层乳栿、上层丁栿和上层四椽栿底面的飞天也同样如此。按上一说法自穆宗以降，至兴宗重熙年间，历时不长，同时，该时段也没有重大自然灾害的纪录，根本没有落架重修之必要。其

① 《钦定续通志》卷一百七十。

② 王晶辰、王菊耳主编：《辽宁碑志》，《朝阳刘承嗣墓志铭》，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 年。

③ 张连义：《奉国寺始建年代及建因刍议》，《东北史研究》2005 年第 4 期。

④ 梁思成：《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梁思成全集》第二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年。

次，在彩绘飞天之下也没有发现彩绘因重绘而被覆盖的迹象，如果是改宫为寺，彩绘必经重绘，彩绘飞天之下应有一层原来彩绘的痕迹，而不落架，彩绘又不可能进入构件节点之内。这足以说明大雄殿的彩绘是在构件制作之后，安装上架之前绘制，并且保存至今而未经重绘。而以飞天作为彩绘主题当然反应的是佛教内容，自然殿宇也是为宗教用途而建，因此，仅此一点即可排除初建时为宫殿后改为佛寺的可能性。

除上述几种观点之外，迄今采用最为广泛的建寺年代为辽开泰九年（1020年），介绍奉国寺的文章多引用这一时间作为奉国寺创建时间。否定了其他观点之后，建于开泰九年的结论是否可信，就须从建筑自身入手，反证其合理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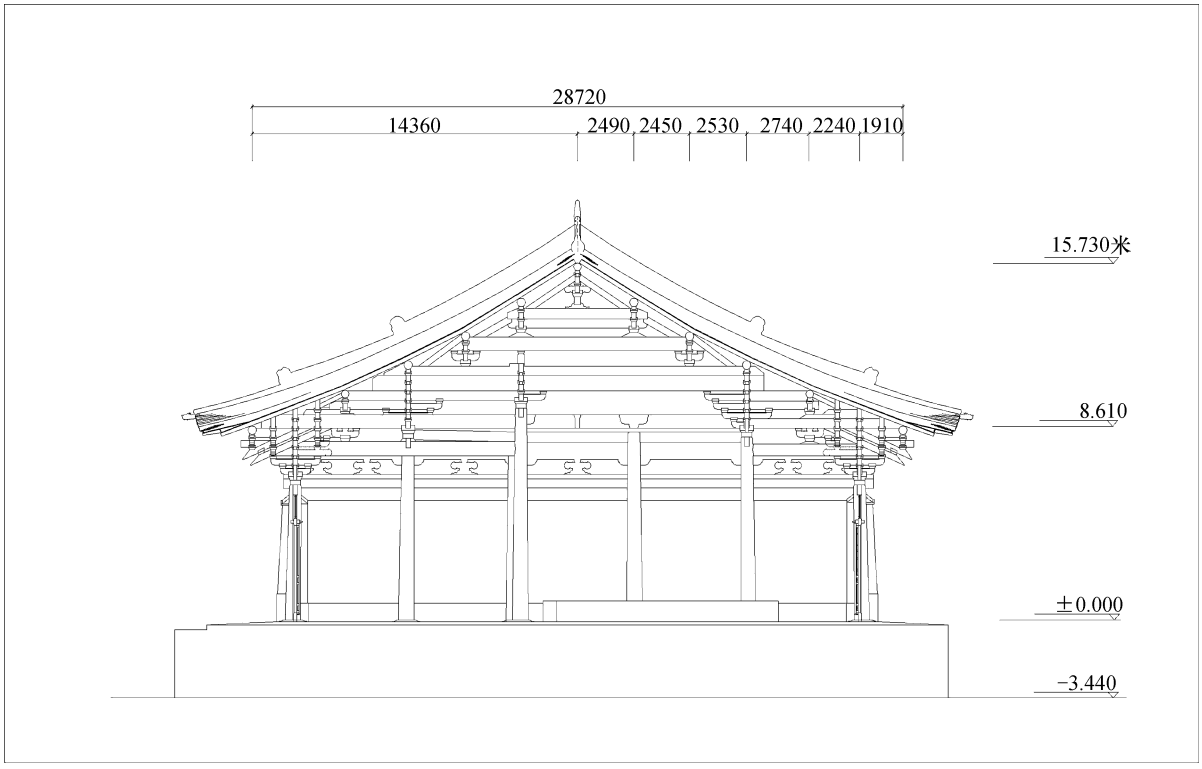
辽代木结构建筑保存至今和已毁但见于著录者包括天津蓟县独乐寺山门[①]、观音阁[②]、河北新城县开善寺大殿[③]、河北涞源阁院寺文殊殿[④]、山西大同华严下寺薄伽教藏殿[⑤]、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⑥]、山西大同善化寺大雄宝殿[⑦]、山西大同华严下寺海会殿[⑧]、天津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⑨]等数座。其中建筑年代确切者五例，独乐寺山门、观音阁，建于辽统和二年（984年）；宝坻广济寺三大士殿，建成于辽圣宗朝太平五年（1025年）；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及壁藏，建于辽重熙七年（1038年）；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建于清宁二年（1056年）。以上实例虽然数量不多，但建筑年代上自辽代早期晚段，下至晚期早段，有一定的时间跨度，为确定其他建筑的时代提供了难得的参照。以下即从奉国寺的建筑结构特征，构件细部处理手法入手，与以上诸例纵向比较，将奉国寺大雄殿纳入到独乐寺观音阁—宝坻广济寺三大士殿—薄伽教藏殿—佛宫寺释迦塔的年代序列之中，进而说明大雄殿建于辽开泰九年是合理可信的。

下面仅举数例以证奉国寺大雄殿的建筑年代晚于独乐寺观音阁、早于薄伽教藏殿，其建造年代大体与宝坻广济寺三大士殿同时，此时也正当辽圣宗时期。

1. 阑额和普拍枋的使用

自佛光寺大殿以降，绝大多数木构建筑都用阑额，但用不用普拍枋，阑额与普拍枋是否出头至角柱以外，以及阑额在角柱以外所用的样式，具有强烈的时代性，是确定建筑相对年代的重要依据之一。上述辽代建筑实例中，独乐寺建筑时代最早，其山门不用普拍枋，阑额出角柱之外垂直切割。观音阁上下外檐虽亦不用普拍枋，阑额也不出角柱头，但平座层阑额之上和下层内槽柱头已经出现普拍枋，普拍枋断面既高且窄，保持着早期风格。而奉国寺大雄殿（图一）、广济寺三大士殿、薄伽教藏殿和佛宫寺释迦塔俱用普拍枋，且均出角柱柱头并于角柱之

① 梁思成：《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梁思成全集》第一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
② 同①。
③ 祁英涛：《河北省新城县开善寺大殿》，《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0期。
④ 冯秉其、申天：《新发现的辽代建筑——涞源阁院寺文殊殿》，《文物》1960年第8、9期。
⑤ 梁思成：《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梁思成全集》第二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
⑥ 罗哲文：《雁北古建筑的勘查》，《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3期。陈明达：《应县木塔》，文物出版社，2001年。
⑦ 同⑤。
⑧ 同⑤。
⑨ 梁思成：《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梁思成全集》第一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原载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年第三卷第四期。已毁纪录见《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85年。



图一　奉国寺大雄殿明间横断面图

外垂直切割，处理方法完全一致。而广济寺三大士殿、薄家教藏殿和佛宫寺释迦塔年代确切，均晚于独乐寺山门和观音阁。据此可认为奉国寺年代晚于独乐寺观音阁、山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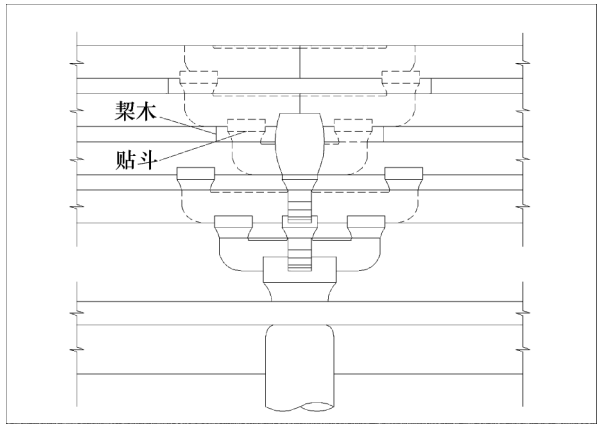
2. 斗栱制度

奉国寺大雄殿外檐柱头铺作为外跳双抄双下昂七铺作，重栱偷心造，里跳双抄五铺作。上述几例中柱头铺作与大雄殿形制可比者有三，一为独乐寺观音阁上檐柱头铺作；二为薄伽教藏殿壁藏；三为佛宫寺释迦塔一、二层檐下柱头铺作。大雄殿与观音阁上檐柱头铺作相比，皆用批竹式双下昂，所用耍头均为直下平切的方平耍头，形制、风格一致，不同处仅在于观音阁柱头铺作里跳单抄。薄伽教藏殿壁藏做双抄双下昂七铺作重栱，第一跳华栱计心，批竹昂式耍头。佛宫寺释迦塔一、二层檐下柱头铺作为外跳双抄双下昂七铺作，重栱偷心造，里跳双抄五铺作。其中一层耍头样式与大雄殿一致，二层以上耍头样式均不同于一层。大雄殿补间铺作外跳与柱头铺作相同，转角铺作两侧各加附角铺作一朵，这一特点仅在薄伽教藏殿壁藏中出现。

从斗栱发展的实例来看，早期建筑如南禅寺大殿、佛光寺大殿、平遥镇国寺大殿等外跳俱偷心造，而计心造出现相对较晚。比较知双抄双下昂重栱偷心造辽代早晚皆有，故从斗栱制度来讲大雄殿时代晚于独乐寺，但有较薄伽教藏殿壁藏为早的可能，而佛宫寺释迦塔则是此铺作形制的沿用。

3. 隐出栱与贴斗手法

奉国寺大雄殿各类枋上大量隐刻栱，栱端施斗，柱头铺作于第二、三层柱头枋上乳栿两侧各施栔木，于隐刻栱位置贴斗（图二），这一做法与独乐寺观音阁柱头铺作完全一致[①]。



图二　大雄殿柱头铺作贴斗示意图（背立面）

4. 角梁样式

大雄殿大角梁外端平直，收分显著，头做两瓣卷杀，与独乐寺观音阁角梁形式如出一辙[②]。上述大雄殿与观音阁隐出栱、贴斗做法及大角梁样式的一致性，说明大雄殿与独乐寺时代相对接近。

5. 柱子高度与直径

柱子高度和柱径的比例虽不必然反应时代特征，但因与用材相关，在大的趋势上，同时期建筑柱高与径之比仍可能一定程度上趋同。从表一对比可见，除薄伽教藏殿之外，各例柱高与径之比均在8.8∶1之下，比例比较接近，因此，五座建筑中，薄伽教藏殿时代应该最晚，大雄殿年代比薄伽教藏殿稍早一些。

表一　几座辽代建筑柱高与柱径比较（单位：米）

单位	观音阁下层	独乐寺山门	广济寺三大士殿	薄伽教藏殿	奉国寺大雄殿
檐柱高	4.35	4.33	4.38	4.99	5.95
柱径	0.50	0.51	0.51	0.51	0.68
高/径	8.7∶1	8.65∶1	8.6∶1	9.78∶1	8.75∶1

6. 梁栿断面比例

木结构建筑梁栿断面高宽比例一般认为是由大向小发展变化的，可以作为断代依据之一。

① 杨新：《中国古代建筑· 蓟县独乐寺》，文物出版社，2007年。
② 同①。

从表二的梁栿断面尺寸和比例的比较可以看出，独乐寺山门、观音阁断面比例明显大于广济寺三大士殿和奉国寺大雄殿，可见后两者时代应晚于前两者。

表二　几座辽代建筑大梁广厚比较（单位：米）

单位	观音阁下层	独乐寺山门	广济寺三大士殿	薄伽教藏殿	奉国寺大雄殿
梁广	0.58	0.54	0.53	51	0.70
梁厚	0.30	0.30	0.35	34	0.46
广/厚	1.93∶1	1.8∶1	1.51∶1	1.5∶1	1.52∶1

7. 举折

建筑虽经历代重修而发生改变，但举折是很少发生改变的，其举高与前后槫距之比由小向大发展变化，也有很强的时代性。上述诸例中独乐寺山门、观音阁均为殿堂结构，薄伽教藏殿为九脊式，佛宫寺释迦塔为多层楼阁，唯广济寺三大士殿与奉国寺大雄殿同为五脊厅堂结构，具有可比性。广济寺三大士殿举高4.85米，前后撩檐槫距18.5米，二者之比为0.262∶1；奉国寺大雄殿举高7.20米，前后撩檐槫距28.72米，二者之比为0.251∶1，比例几近一致，而奉国寺略小。

8. 梁架结构和构件表现手法

上述几例中广济寺三大士殿与奉国寺大雄殿同为五脊厅堂结构。大雄殿为九间十椽，就横架而言，东西两稍间间缝用六柱，而于当心六缝采取前四椽栿对后乳栿上呈六椽栿用四柱，六椽栿与前槽四椽栿重叠两椽长的结构。三大士殿为五间八椽，两山和两稍间间缝用五柱，当心间两缝则将前内柱后移一步，采前三椽栿对后乳栿上呈四椽栿用四柱，使内槽四椽栿与前槽三椽栿重叠一椽长的梁柱结构，两者也都于内槽两下施顺栿串。

此外，两殿正脊均不推山，故均配置太平梁两根，平梁上均以驼峰、蜀柱、施丁华抹颌栱和叉手戗襻间、脊槫，并于上平椽、中平椽、下椽用托脚。这种结构手法与广济寺三大士殿完全相同，从建筑断面看来，除进深不同而至梁架跨度不一外几乎完全一致。

在构件细部手法上，奉国寺大雄殿与广济寺三大士殿东西两山上平槫下施攀间枋出头，下中平槫之下襻间枋自转角处出头，两者均作批竹昂式耍头。殿内大量使用“鹰嘴驼峰”、“翼型栱”和隐刻栱等也是两者的手法相一致的地方。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比较分析，大雄殿在普拍枋的使用、斗栱制度、隐出栱与贴斗手法、角梁样式、柱子高度与直径、梁栿断面比例等方面均表现出晚于独乐寺山门、观音阁而早于薄伽教藏殿的特点，而在举折、梁架结构和构件表现手法上与三大士殿有强烈的一致性。据此可断定奉国寺大雄殿建造年代与广济寺三大士殿相当，而大雄殿大梁广厚比例大于三大士殿，举高比例小于三大士殿，虽然相差甚微，当仍有时代略早于三大士殿的迹象。鉴于后者建于辽太平五年（1025年），则元代《重修大奉国寺碑》所记之大雄殿建于辽开泰九年（1020年）的记载是完全可信的。

The Creation Date of Ancient Building Daxiong Hall of Fengguo Temple

Liu Zhenlu[1]　Wang Yaping[2]

(1. Jinzhou Municipal Museum, Jinzhou, 121000; 2. Centre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in Liaoning, Shenyang, 110000)

Abstract: Daxiong Hall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remains of architecture in the Liao Dynasty, but its exact date is still in question. By the analysis of building structure and features of Daxiong Hall and the other architectures of Liao Dynasty with exact age, the paper consideres that the creation date, that Daxiong Hall was built in the time of Kaitai in Liao Dynasty, recorded on the monument of Yuan Ddynasty, is credible.

Key words: Fengguo Temple; Daxiong Hall; creation date

试析青海嘉木样活佛府的建筑特色

李光明
（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郑州，450002）

摘　　要

嘉木样是塔尔寺的重要活佛系统，曾受清康熙帝册封，在藏传佛教中具有较高的宗教地位，一世至六世皆为拉卜楞寺寺主。位于塔尔寺内的嘉木样活佛府邸融合了多民族的建筑风格和汉化元素，多区域和多宗教因素并存，在寺内众多活佛府中独具特色。

关键词　藏传佛教；嘉木样；活佛府；建筑特色

一、概　　述

青海省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部，自古就是西藏、四川、内蒙古与中原地区沟通交流的枢纽地带。位于青海省湟中县的塔尔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六大丛林之一，寺内的建筑、雕塑、油塑、壁画、堆绣及其藏传佛教文化等都体现了历史悠久的藏汉文化交融。寺院坐落在八瓣莲花山坳之中，建筑主要由宗教殿堂、活佛嘎尔哇（府邸）和僧舍组成。其建筑形制和布局以拉萨三大寺和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为蓝本，反映了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状况，是运用汉族传统建筑手法最多、兼具藏族建筑风格和青海地方特色的一座寺院。寺内目前保存着众多风格各异的活佛府邸，成为塔尔寺建筑组成上的一大特色。塔尔寺系格鲁派宗师宗喀巴的诞生地，是明清两代格鲁派宗教中枢所在地[①]，明、清政府对其格外重视，对寺内的活佛也册封有加，客观上加速了活佛府邸的增修和扩建。寺院鼎盛时期，活佛府邸达到 83 座，其形制和规模因各自的宗教地位、经济实力、贡献大小和族属渊源而各不相同[②]。嘉木样活佛府是其中较有特色的府邸之一。府邸位于寺内西北部，坐落在拉才夏冬区，依山而建，半挖半填式基础，坐北朝南，外有夯土墙围护。嘉木样活佛系统在清初曾受到康熙皇帝册封，在藏传佛教中具有较高的宗教地位，一世至六世皆为拉卜楞寺寺主。其中二世嘉木样于乾隆年间兼任塔尔寺法台，始建该府邸。1849～1851 年间，该府邸由三世嘉木样进行了扩建，后长期无大规模维修。直至民国初年，青海省国民政府主席马步芳对活佛府进行了最后一次较大修缮。

二、建筑布局和形制

活佛府由外院、内院两层院落环套组成。正面藏式墙和其余三面夯土墙，围合成略呈长方

① 弘学：《藏传佛教》，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年。

② 许德存：《藏传佛教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 年。